
面向以地区研究为基础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研究

宇野重昭

(UNO Shigeaki, 岛根县立大学)

必须改变中国研究的方法

今天，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并且对中国未来的评价这个重要问题上也总是摇摆于过大与过小之间。因此，对于中国在当代世界史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在学术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过去在日本的中国研究，有近代以前的古典、历史、语言研究、明治后期到昭和前半期的殖民地中国研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的中国“地区研究”。现阶段具压倒性影响力的就属地区研究了。

这种地区研究的方法，笔者1950年秋在进修大学的专业课时实际上引起过很大的反响，以语言、历史、地理为基础、综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思想论等学说，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还要将它扩展运用于对西欧等发达国家的研究领域。当时，距1943年开始出现地区研究的概念只有7年时间，研究者们还醉心于创造新的学问和推进共同研究计划。

但就是在同一时代，也有人早早地对综合各学科的地区研究（能否取得）学术性成果产生了疑问，他们对各学科综合的“片面性”（即即使在部分可能进行科学分析，但研究对象的地区、国家的全体框架却不可能浮现出来）进行了批判。因此，尽管像东京大学的教养学科国际关系论分科曾被要求动员开展结合地区研究开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法、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比较思想史等）科学性的综合研究，但是这样的主张并没有成为（日本的）亚洲研究的主流。

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以“对以前的地区研究进行真正的方法论上的讨论为前提，提出新方法论的范畴”为目的，在日美欧学术界的地区研究中的中国研究与中国学术界中由中国研究学者开展的作为本国研究的中国研究之间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我举双手赞成这样的尝试。上世纪60年代初哈佛大学的舒尔茨教授曾经对笔者提过，日本人的中国研究、美国人的中国研究、中国人自己的中国研究都各有各的意义，现在更能体会到此话的含义。

影响力必将扩大的中国

首先，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况。

现在对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严厉批判成为在日本占优势的风潮，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迟缓、失业者增加的不安定、法律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拥有超过总贷款额三成坏账的国有银行、农业自给率下降的深刻问题和内需预测上的混乱等。像〈大象中国是个幻影吗〉（2002年《朝日新闻》）这样的充满疑问的文章很多。这些问题尽管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屡屡被提到，但还是有人指责一般的中国人很意外地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问题（2002年6月20日《政府刊行物新闻》、〈万华镜〉）。

可能不得不认为这是面对急剧变化中的世界和全球化的（中国的）“脆弱性”的表现吧（庆应大学 CAS 通讯 No. 122）。

但是即使这样，今天的中国国力正在稳步增强也是事实。正如许多中国政府的官方资料所力证的那样，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4%，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升至世界第六位，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从“温饱”阶段进入了“小康”阶段。尽管可以预料这个成长率今后会出现若干减速，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国国力的相对上升。根据《朝日新闻》对将来中国是否强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十年后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大国是谁”进行的预测中，日本人中认为是中国的为47%，美国为14%，日本8%；韩国人中认为是中国的为53%，日本为23%，韩国11%。中国人中认为中国会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占73%（2000年12月5日）。

当然有些专家也认为到2010年为止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会降低到6—7%，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可以说中国必将成为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发达国家”的中国会如何行事

问题在于，将来成为发达国家后的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这个问题总是会和某种价值观交汇在一起。但是作为研究方法原点的“学术关心”还是应该在探讨方法论中将自己置身于客观之中。

现在，笔者想在这里第一次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笔者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和鹤见和子教授等组织了“现代化再检讨研究会”，鹤见教授1974年提倡“内发型发展理论”后，笔者也一直予以全力支持，探讨这种方法论适用于一般社会科学各种形态的可能性。另外著名的柯文教授因发表《在中国发现历史》而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时，笔者也和教授进行过讨论，一致认为要重视“中国的历史和内发型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在注重与外来的异文化接触的同时，拒绝以它为标准演绎历史和全局。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在很大程度上与今天的主题演讲者沟口雄三教授的原点回归论和“天下之民”理论有同感。沟口教授在《思想》杂志〈思想的语言〉一文中主张，“中国历史把分裂的时代和异民族的统治时代也都算在正史的范畴内，因此在中国，民众与其说是国家的民众，不如说是天下之民”，“在清朝，民间的力量在和权力结合的同时自身也在壮大”。这个现象在民国建立之后也没有发生改变。不管权力一方的政策如何不断变化推移，民众却总是在与权力的不断融合和时常的抗争中壮大着自己的力量。尽管现在因地点、地区、社会地位而产生了巨大的隔差，但就在今天民众也在与权力保持微妙的距离与关系并时时与之融合

的同时，扩大着自己的力量。

因此，在权力方看来，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带动“民”、引导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现在的中国领导者们不断地强调“不仅要提高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统计指标的达标率，也要全面反映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情况”（2003年8月《中国图书》15-8）、“一定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国家的法治与德治要互相补充”（2002年11月8日新华社《中国通信》）。在这里尽管存在着权力和民众之间微妙的矛盾和合作关系，但这却是思考符合中国国情之中国政治与历史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发展道路是否能马上对应急剧变动的国际关系，这是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要课题。今天，科学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依然强劲，同时追求各自认同感的多极化趋势也在增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球性的贫富差距、精神上的被压迫感、要求一种新的人类相处原理的呼声正在风起云涌。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上看，（中国）不可能忽视这些因素向前发展。比如即使站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立场上，中国也不会采取（反恐是）自由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对抗这种美国式的单纯模式。如何从中国传统上的权力与民众之间微妙的矛盾与合作关系、物质生活的提高与属于精神生活的道义主义相结合的互补关系的角度出发，如何判断新的国际关系下的中国外交，并且据此如何具体地创新今后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探讨）这些课题正是笔者的目标。

（刘星 译）